

# 《国朝宫史》的编纂与 乾隆年间的宫廷学研究

陈连营 张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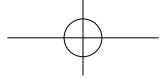
**内容提要** 动用国家人力、物力，大规模编纂当代宫廷史、对当代宫廷收藏以及文化活动进行系统整理和编纂相应文献，在清乾隆年间以前是闻所未闻，有之，则自乾隆敕修《国朝宫史》始。伴随着《国朝宫史》的编纂，清代官方对清宫廷建筑、园囿、内廷人员及机构设置与管理制、典制、经费、收藏与文化活动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系统整理和记录，这项工作为后代的宫廷文化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翔实资料，奠定了清代宫廷史、古代艺术与文献等诸多领域的重要研究基础，并为现代宫廷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 清代 乾隆年间 宫廷学

作为具有鉴往知来作用的历史学，在中国古代一直备受重视，不仅民间的知识菁英关注于此，朝廷也设置了相应的史官，专职记载当代史实，并予其一定的秉笔直书的特权，甚至自唐代以后逐渐形成了官修前代专史的传统。然而，史书对于皇室私密宫廷生活(包括建筑空间、机构设置、礼仪制度、文化活动等内容)却少有涉及。关于宫廷生活的文献除了作为礼仪、制度的内容在官修史书中略有记载(如机构设置、礼仪制度、著名人物事迹等)，或者出于某位最高统治者的个人爱好而推动者，诸如对宫廷收藏的整理和编纂活动外(如宋代《宣和画谱》、《博古图》等图书的编纂)，多是有心文人得知于见闻或传闻的笔记小说者流(如明末刘若愚《明宫史》、孙承泽《春明梦余录》等典籍)。至于动用国家人力、物力，大规模地编纂当代宫廷史、系统整理当代宫廷收藏以及文化活动并编纂相应文献，在清乾隆年以前是闻所未闻的，有之，则自乾隆敕修《国朝宫史》始。这其中的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出于为尊者讳的文化传统的制约；二是深宫密勿之地，外人难于明了就里。本文即针对《国朝宫史》的编纂活动，以及乾隆年间相关宫廷学的研究略作探讨。

## 一 《国朝宫史》的编纂

《国朝宫史》是清乾隆年间敕修的一部史书，记述了清代顺治至乾隆年间内廷的典章制度、宫苑建置以及重要事件。全书共三十六卷，其中第一至第四卷记录顺、康、雍、乾四代皇帝对内廷的训



谕；第五至第十卷记录内廷各项重大典礼制度，其中包括宫规、仪卫及内廷等级森严的冠服；第十一至第十六卷记录内外宫苑的建制规模及皇帝题咏各宫苑的匾额诗文；第十七至第十九卷记录内廷的经费开支，其中包括铺宫、年例、日用、恭进、恩赐，及各礼宴钱粮例用；第二十、二十一卷记录内廷官制的条例及职掌、额数；第二十二至第三十六卷记录清代内廷编纂刊刻的书籍，其中包括有关皇帝的实录、圣训、御制诗文集，方略、则例及天文、舆地、小学、金石、经史子集各部图书等。

乾隆皇帝命儒臣纂修这部宫廷史书，其用意十分明显。他在为此发布的上谕中说，因为看到记载明朝宫廷史事实的《明宫史》一书，很有感慨。他认为，明代并非亡于宦官。使宦官得志揽权、肆毒海内的，主要是人君的过失。他指责明代中叶以后，皇帝长期不接见群臣，听任宦官“导谏纵逸，愈溺愈深”，遂使“是非由其爱憎，刑威恣其燔炙，兵事任其操纵，利权归其掌握。倒持太阿，授之以柄”。他历数亡明内廷的各种弊端：“明代内监多至万余人，冒滥名器，蟒玉盈廷；子弟亲族，盘据窟穴；政府言路，凭藉奥援；羽翼腹心，势焰熏灼，驯至不可收拾。”甚至“京城内外以及西山琳宫、梵宇，大珰修建者十居八九。莹域封树，制拟山陵，华表丰碑，大书屹立，工费率钜万计，自非恣侵渔而广贿赂，何所取诸”？他夸耀清代自顺治入关，历经康熙、雍正及于己身，已百有余年，一直对宦官严加管束，以致“从无一人能窃弄威福者，固由于法制之整肃，而实由于君德之清明”。弘历列举清代在内廷管理方面比明代高明之处，并说：“不有成书，奚以行远？”他决定纂修本朝宫史，就是要使“后嗣子孙，世世遵循。当其知所则效，知所警戒”。“守之弗替”，“永永勿致”<sup>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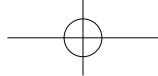
对于这些用意，乾隆皇帝在许多文字里都有明确表示。如乾隆皇帝关于编纂《大清会典则例》的上谕中就指出，“国家立纲陈纪，布在方册，所以明昭代之章程，备诸司之职掌，以熙庶绩，以示训行，典至钜也……矧际重熙累洽之期，当礼明乐备之日，敕几慎宪，职惟其时，是当博考朝章，详稽故实，正旧编之纰缪，补记载之阙遗，用藏成书，垂示法守”<sup>2</sup>。所以《国朝宫史》提要称：“编辑是书之旨，拳拳于立纲陈纪，聆听明训，为万万世遵循之本，盖齐治平之道，并具于斯矣。”

关于《国朝宫史》的编辑细节，当事人语焉不详。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是，该书于清乾隆七年（1742）十一月，由乾隆皇帝敕命内廷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等人编纂而成，乾隆二十四年，再令蒋溥等人详细校正，重加编辑。乾隆二十六年又派于敏中等帮同校录，至乾隆三十四年底成书，并收入《四库全书》史部。那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尽管乾隆在上谕中已经规定了该书内容、体例，如“首载敕谕诰诫，诸如宫殿、舆服、典礼、爵秩、经费，凡有关掌故者，备识兼该”<sup>3</sup>。又责成内廷大学士等主持其事，从上谕和图书署名来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等奉敕编纂，蒋溥、裘曰修、

1、 《国朝宫史》卷首，圣谕。

2、 《大清会典则例》卷首，乾隆上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0册，页1。

3、 《国朝宫史》卷首，圣谕。



王际华、钱汝诚、于敏中、陈孝泳等人具体负责。可为什么此项工作竟然持续了27年才最终完成？

从客观上讲，编纂《官史》对编纂人员来说是一个新课题，他们对于宫廷制度、殿座情况、内廷收藏等内容并不完全熟悉，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充分了解和整理。而从早期主持人的个人状况来看，他们均年事已高，且忙于主持政务，精力有限。从张廷玉、鄂尔泰年谱的记载看，两人当时已“年齿俱老，难于久立”，因而乾隆皇帝特许其“升殿视朝，不必侍班”<sup>1</sup>。徐本年龄不详，但基于他在乾隆十年已年老退休，并很快去世的情况判断，应该也有相当年龄（鄂尔泰也于乾隆十年四月去世）。基于他们均年事已高，加之乾隆于八、九、十年连续出巡祭祖，每次均令张廷玉、鄂尔泰等留京办理政务等实际情况，可以推测此书编辑工作在乾隆十三年以前似乎并没有真正启动。

再，据《赵瓯北(翼)先生年谱》乾隆十四年己巳条记载，赵翼当年二十三岁，“失馆无以自给，襁被入都，才名一日动辇下，刘文正公统勋时为总宪，即延先生于家，纂修官史”。同书十五年条记载：“(顺天乡试)既出榜，文端公(汪由敦)知先生所修官史已告成，即延先生于家代笔札，凡应制诗文，皆先生属草。”<sup>2</sup>时人孙星衍撰赵翼墓志铭也说：“先生生有异禀，三岁识字。十二岁为科举文，一日辄成七篇。时令甲未以诗试士，特好为之，兼为古文。十九岁，入县学；游学都门，才名动辇下。刘文正公时为总宪，延至家纂修官史。”<sup>3</sup>

据以上文献可知，《国朝官史》的主要编纂工作应该是在乾隆十四五年间完成的，真正主持其事的应该是时任刑部尚书兼管翰林院事务的刘统勋，编辑工作应该是刘统勋延请的知名举人、后成为著名学者的赵翼。由于当时的成稿并不成熟，或者说并没有令乾隆满意，因而有乾隆于二十四年以原修《国朝官史》“阅时既久，且多草率缺略之处”，令蒋溥、裘曰修、王际华、钱汝诚等人“著即将原书再加详细校正，增修妥协”，并于乾隆二十六年加派于敏中、供奉懋勤殿举人陈孝泳“帮同校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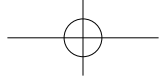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国朝官史》书成，遂成为其他官修图书的重要参考资料。乾隆三十九年窦光鼐、朱筠等奉敕撰《日下旧闻考》，其中苑囿等门，不少内容参考了这部官史。就是后来纂修的《大清会典》、《会典事例》等书，也同样照搬其中的内容。可见其资料之博洽翔实，非一般史书及笔记可比。可惜，《国朝官史》书成之后，“缮录三册，一贮乾清宫，一贮尚书房，一贮南书房”，向无刻本。辛亥革命后，这部深藏宫中的珍贵史料才为人发现。

嘉庆五年(1800)，大学士庆桂、王杰、董诰、朱珪、彭元瑞、纪昀等又奉敕编纂《国朝官史续编》，将乾隆二十七年以后的内容编为该书。仍按《官史》的六大门分类，子目略有增加。如《训谕》一门，较多的谕旨仍然是约束太监的，但还收录了一些教育皇子的谕旨。书成凡一百卷，篇幅增加了近一倍，堪称乾嘉时期官史资料集大成之书。

1> 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90册，张廷玉《澄怀老人自订年谱》；第91册，《鄂文端公年谱》。

2> 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05册，页333、335。

3> 赵翼事迹资料见《国朝耆献类徵初编》卷二〇二，《国朝先正事略》卷四三《赵翼》。



## 二 宫廷收藏的研究

伴随《国朝宫史》编纂工作的展开，乾隆还敕令内廷翰林对宫廷收藏的前代各类书画、珍本图书、尊、彝、鼎等文物，以及顺治、康熙、雍正年间，甚至自己敕令编纂的图书，进行整理并编辑成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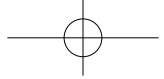
对于历代传承下来的典籍，乾隆于九年令内廷翰林对宫中收藏的珍本图书进行清理，择其善本进呈御览，在乾清宫昭仁殿列架度置，赐“天禄琳琅”。并于次年指派大学士于敏中等编辑《天禄琳琅书目》十卷，“以垂示方来”<sup>①</sup>。该书著录清宫所藏宋元以来精刻精钞善本书籍1000余部，同一书两种刻本或同一版两印皆精者均收录在内。按版本时代顺序编排，同时代版本以经史、子、集为序。明代影宋钞本和影辽钞本分列于宋版、辽版之下。每书不仅著录书名、卷数、著者时代、著者姓名、著作方式、篇目版本等，而且收入重要序、跋、题、识、牌记。此外还用楷书摹写书中钤印的藏书印记。该目录对以后版本目录的编制有一定的影响。书成后归入新完成的《四库全书》。光绪十年(1884)长沙王先谦合其前后编刊行。嘉庆二年(1797)乾清宫遭火，宫内又把一部分图书分赏个人，故该目录所收图书今已残缺。其后，施廷镛编有《天禄琳琅查存书目》，张允亮编有《天禄琳琅现存书目》，1932年故宫博物院辑印《天禄琳琅丛书》。遗存图书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

此外，《国朝宫史》第二十二至第三十六卷“书籍”一门，将这一时期官修的重要书籍的篇名、编书缘起、内容梗概和御制序文集中在一起，分为实录、圣训、御制文集、方略、典则、经学、史学、仪象、志乘、字学、类纂、总集、目录、类书、校刊、石刻，共16项予以著录，反映了当时文化活动的空前繁荣。

乾隆还敕令廷臣编撰了《石渠宝笈》、《秘殿珠林》初续编，著录历代传承下来的珍贵书画，内府有关佛教、道教之书画藏品。分历代名人画(附印本绣锦缙丝之类)、臣工书画、石刻木刻经典、语录科仪及供奉经相等类。各类用阮孝绪《七录》之例，先佛后道，再循以往鉴赏之通例，先书后画，依次著录册、卷、轴等。所著录的书画分上、次二等，上等系真迹且笔墨至佳者，详载其纸卷、尺寸、跋语、藏印等；次等系真迹而神韵较逊或笔墨颇佳而未能确辨其真伪者，仅载款识及题跋人名。以往《宣和画谱》等书亦收录释道内容，但专以释道书画别立一书者此书为首例。

《石渠宝笈》初编成书于乾隆十年，专录内府藏非宗教题材书画，编纂方法和编纂者大体同《秘殿珠林》。《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成书于乾隆五十八年，由王杰、董诰、彭元瑞、金士松等奉敕编，录初编未收及臣工新进的作品，体例依初编，唯不分等次。《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稿本28函，120册，由英和、黄钺、姚文田、吴其彦等奉敕编，收初、续编后入藏内府的2000余件作品。清代宫廷收藏极富，许多法书名画尽入内府。上述著录的编纂虽为皇帝取阅赏玩方便，却为后世保存了极为丰富的资料，对研究画史、考证法书名画的流传和鉴定，具有重要价值。

① 乾隆《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首提要，《四库全书》第675册，页341。



对于内廷收藏的尊、彝、鼎、鬲等器物，乾隆敕令廷臣编撰了《西清古鉴》、《西清续鉴》和《宁寿鉴古》等著录清宫收藏的古代铜器的大型图录。《西清古鉴》的编纂始于乾隆十四年，完成于乾隆二十年，并由武英殿刻本印行。书前有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初七日上谕一道及纂修《西清古鉴》诸臣职名，分别为梁诗正、蒋溥等编修，陈孝泳、杨瑞莲摹篆，画院供奉梁观、丁观鹤等绘图，励宗万等缮书。全书4函，42册，收录商周至唐代铜器1529件(包括铜镜)，尤以商周彝器为多。乾隆帝还亲自参与了《西清古鉴》的编著，和硕庄亲王、和硕果亲王担任该部书的监理。编纂者除梁诗正、蒋溥、汪由敦外，还有嵇璜、裘曰修、金德英、观保、于敏中、董邦达、王际华、钱维诚等重臣，涉及吏、户、工、兵、礼等五部。此书体例仿《宣和博古图》，每卷先列器目，按器绘图，后有图说，并注明方圆围径，高广轻重，如有铭文，则附铭文并加考释。“以内府所藏古鼎彝尊鬲之属案器为图，因图系说，详其方圆围径之制，高广轻重之等，并钩勒款识，各为释文。摹绘精审，毫厘不失，则非往之图谱所能及。”<sup>1)</sup>据网络检索所得的信息，书中著录的青铜器除部分佚失外，大部分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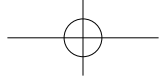
继《西清古鉴》之后，乾隆又敕令王杰等编纂了《西清续鉴甲编》及《西清续鉴乙编》，二书于乾隆五十八年编成，共二十卷。其中《甲编》收录清宫续得的商周至唐代的铜器944件，另附收唐宋以后铜器和玺印等31件，共计975件；《西清续鉴乙编》收录盛京(今沈阳)清故宫所藏商周至唐代的铜器900件。又将续得选贮于宁寿宫之商周至唐代的铜器701件另编为《宁寿鉴古》(亦名《宁寿古鉴》)十六卷。《西清续鉴》甲、乙编及《宁寿鉴古》，编写体例均与《西清古鉴》同。此四书通称《西清四鉴》。因受时代和鉴藏人水平所限，书中也收录了不少伪器，在释文、考证方面也存在一些错误。由于各书所收器物一向深藏清宫，且数量很大，对研究古代青铜器具有重要价值，成为文物图谱编纂的范本。

乾隆曾言编辑此书的目的：“我朝家法不事玩好，民间鉴赏，概弗之禁，而殿廷陈列，与夫内府储藏者，未尝不富，朕于几务晏闲间加品题，夷考旧图，多所未载。因思古器显晦有时，及今不为之表章，载之简牘，考索者其奚取征焉？爰命尚书梁诗正、蒋溥、汪由敦，率同内廷翰林，仿博古图遗式，精绘形模，备摹款识，为《西清古鉴》一编，以游艺之余功，寄鉴古之远思，亦足称升平雅尚云。”<sup>2)</sup>

清内府藏砚颇多，包括流传自前朝各代的与本朝的收藏，均陈列于乾清宫东暖阁。乾隆皇帝认为所藏砚台年代久远却无综合记录，若遗失可惜，遂于四十三年命内廷侍臣于敏中、梁国治等人甄别优劣，作成图谱，厘为二十四卷，目录一卷。《砚谱》卷一至卷六所载皆属陶砚，上起汉未央宫东暖阁瓦砚，下至明旧澄泥四直砚；卷七至卷二十一所载皆属石砚，上起晋王廞璧水暖砚，下至清朱

<sup>1)</sup> 乾隆《西清古鉴》提要，《四库全书》第841册。

<sup>2)</sup> 乾隆《西清古鉴》卷首，上谕，《四库全书》第841册，页1。



彝尊井田砚。以上砚台共计200枚，图464幅。卷二十二至卷二十四为附录，所载诸砚41枚，图108幅，皆系松花、紫金、驼基、红丝诸品及仿制澄泥各砚等。全书以图系说，详记砚之尺度、材质、形制、出处及收藏鉴赏者的姓名，核其纪年、署款、公私印记，历朝史传所记载亦细加考证。前人铭跋附于宸章之后，臣工奉敕题名。各砚之正、背、侧面由宫廷画师门应兆奉敕描绘，凡有御题、御铭、御玺及前人款识、印记等，也由宫中专事篆、隶书法之人摹写。图文并茂，勾摹俱精。书成之后，乾隆帝赐名《西清砚谱》，并冠序于卷首。时人曾称赞说：“是谱取内府所藏各砚，图其正背，间及旁侧，并恭摹御制题铭与前人之款识，凡尺度材质形制之殊，悉皆详述，而收藏赏鉴诸家姓名，及旧人铭跋，诸臣奉敕所题，均得附录。宸章之后，计瓦石之属为砚二百，凡四百六十四图，后附松花、紫金、驼基、红丝诸品，及仿制澄泥各种，为砚四十一，凡百有八图，古藻之垂昭映万古，于以上供乙览，传示来兹，自有砚谱以来未有如是之大观者也。”<sup>①</sup>虽然“自有砚谱以来未有如是之大观者”一说未必恰当，但该书为研究我国古砚史提供了极为形象与翔实的宝贵资料，是了解清宫所藏历代名砚概况及其流传经过的重要参考书，确实起到了“上供乙览，传示来兹”的目的。不过此书纂修告成之后久未刊行，仅奉旨缮录正本数部，陈设于大内、园囿和盛京等处。所知传世者仅有4部足本和1部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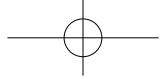
此清乾隆四十三年内府写绘本，4函24册。采用白口，单鱼尾，四周双边，朱印框栏，磁青色绢书衣，蓝绸函套的装帧形式，颇为精美。书前有清乾隆御制序，序言首页框栏处钤“乾隆御览”之玺。序后为凡例、目录。

当时清内府还收藏有大量古代钱币，乾隆十五年敕令梁诗正等人纂辑而成《钦定钱录》十六卷，附于《西清古鉴》之后。《钱录》是研究中国历代钱币的著作。宋代以前所著《钱录》各书，皆已失传。清《钦定钱录》共收录自伏羲氏以来，至明代崇祯年间的古钱币，以及外国货币、厌胜钱共500多种。《四库全书》提要称赞说：“是编所录，皆内府储藏，得于目睹者为据，故不特字迹花纹一一酷肖，即围径之分寸毫厘，色泽之丹黄青绿，亦穷形尽相，摹绘逼真，而考证异同，辨订真伪，又皆根据典籍，无一语凿空，盖一物之征，亦见责实之道，与稽古之义焉。至于观其轻重厚薄而究其法之行不行，观其良窳精粗而知其政之举不举，千古钱币之利弊，一览具睹，又不徒为博物之资矣。”<sup>②</sup>因此成为研究中国古钱币的一部重要的参考书。

至于当时对内廷收藏的名墨、名帖、单幅书画等等内容的整理、考订、甄别、品题，也同样不绝于典籍。如对宋《淳化阁帖》的研究，于乾隆三十四年“摹勒上石”，石版嵌于圆明园内长春园中的蕴真斋廊壁，并因收藏此帖刻石而更名为“淳化轩”，后与圆明园同毁于战火。同时编辑成《钦定重刻淳化阁帖》，该书经折式装帧，函装，共计10册。浓墨擦拓，檀香鸡翅木做封面、封底。黄色撒金册

① 乾隆《西清砚谱》卷末，题跋，《四库全书》第843册。

② 乾隆《钦定钱录》提要，《四库全书》第844册，页2。



页引首和收尾。帖前有乾隆三十四年二月六日御笔序文，和“寓名蕴古”题字。帖后刻乾隆御题淳化轩诗及于敏中恭和诗，于敏中、王际华、裘曰修三人合撰跋文，钱陈群行书跋文和总理、排类、校对、监造、镌刻诸臣衔名。贴名隶书，冠以“钦定”二字。每册均附有乾隆亲笔“校订”御识，和小楷“释文定异”。乾隆还敕令儒臣修成《校正淳化阁帖释文》一书，收入《四库全书》，这可以看做清代研究《淳化阁帖》的最高成就。再如北京北海公园阅是楼所藏著名的《三希堂法帖》等石刻。此不赘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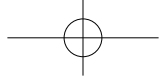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 三 对宫廷生活的记述

此外，同样出于“以垂示方来”的目的，乾隆年间还敕令编纂了主要记载宫廷生活的其他一些图书，如《皇朝礼器图式》、《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古今储贰金鉴》、《八旬万寿盛典》等图书。

《皇朝礼器图式》是记载清代典章制度的政书，全书十八卷，目录一卷。该书图文并茂，分为6部分：卷一、卷二为祭器，卷三为仪器，卷四至卷七为冠服，卷八、卷九为乐器，卷十至卷十二为卤簿，卷十三至卷十八为武备。每种器物皆列图于右，系说于左。每件器物的详细尺寸、质地、纹样以及与相应官职品级的对照，无不条理清晰，记载详备。该书于乾隆二十四年完成。卷首有乾隆二十四年御制序、和硕庄亲王允禄等进书表、乾隆三十一年七月福隆安等补纂告竣进书表、允禄等29位纂修官职名、福隆安等39位补纂官职名。《四库全书总目》评述该书：“所述则皆昭典章，事事得诸目验，故毫厘毕肖，分寸无讹，圣世鸿规粲然明备。”此书对了解和研究清朝的典章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清代宫廷萨满祭祀源远流长，早在努尔哈赤起兵前，爱新觉罗氏即以堂子为萨满教活动之所。清入关后，仿盛京城外东南方堂子之制，于紫禁城东南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建堂子，并仿盛京清宁宫改建坤宁宫，将萨满教信仰习俗带至北京。至乾隆朝已百有多年，唯古制相沿，皆为口授，祝辞仪注，久而小有异同，萨满教信仰也大不如昔。为使其信仰习俗能保留久远，以维系满族人之团结，乾隆帝特敕庄亲王允禄等，将满族各种祭祀仪式、祝辞进行收集、诠释、整理，详细考订，汇编成文，并将祭祀中使用的祭器等绘成图画，于乾隆十二年成书。乾隆帝钦定书名，为之作序，用满文刊行。四十二年，大学士阿桂、于敏中奉谕旨将其译成汉文，四十五年收入《四库全书》。

对于编纂目的和方法，乾隆曾称：“昔时司祝之人，俱生于本处，幼习国语，凡祭神祭天、背灯献神、报祭求福，及以面猪祭天、祛祟、祭田苗神、祭马神，无不斟酌事体，编为吉祥之语，以祷祝之。厥后司祝者，国语俱由学而能，互相授受，于赞祝之原字原音渐致淆舛，不惟大内分出之王等，累世相传，家各异辞，即大内之祭神祭天诸祭，赞祝之语亦有与原字原韵不相吻合者，若不及时改正，垂之于书，恐日久讹漏滋甚，爰命王大臣等敬谨详考，分别编纂，并绘祭器形式，陆续呈览，朕亲加详核酌定，凡祝辞内字韵不符者，或询之故老，或访之土人，朕亲加改正，至精至详。



祈报之义，对越之恢，皆足以昭垂万世。”<sup>11</sup>

全书六卷，卷首有乾隆十二年乾隆帝关于《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编成之满文上谕，次为承办、监绘、誊录该书之诸王大臣、官员等职名，再次为目录。卷末有乾隆四十五年大学士阿桂、于敏中等奉旨将满文译成汉文编入《四库全书》之跋文及奏折。全书备载祭神、祭天、背灯、献神、报祭、求福等各种祭祀活动之祭期、祭品、仪注、祝辞及所用器皿形式图等，是爱新觉罗氏萨满信仰礼俗的总结，也是现今研究清代宫廷萨满祭祀及满族宗教信仰的重要资料。

自雍正年间确立秘密立储制度后，清代皇嗣继承制基本确定下来。但乾隆早期确定的继承人先后因早殇而落空，引起朝臣的担心和猜测。乾隆为自己迟迟不能确定继承人而辩护，因此于乾隆四十八年特命诸皇子同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等，选取历代册立太子事迹有关鉴戒者，按代纂辑《钦定古今储贰金鉴》六卷。自周迄于前明，得33事，又附见5事。而自春秋以后诸侯王建立世子，事非储贰可比者，间叙其概于案语中。纪事取之正史，论断衷诸《资治通鉴纲目》御批，及《通鉴辑览》御批。卷首恭载节奉谕旨，如群书之有纲要焉。目的使“我子孙当敬凛此训，奉为万年法守”<sup>12</sup>。

《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书》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一部木活字印本，也是清代内廷印刷业发达的重要体现。每书前均冠以清高宗御题“武英殿聚珍版十韵”诗并序，次载提要，首页首行下列有“武英殿聚珍版”6字。乾隆三十八年，高宗因《四库全书》编修告成的时日太长，即命儒臣校辑《永乐大典》中的散简零篇和世所罕见的宋元善本，先行刊印流传。同年十月，管理武英殿刻书事务大臣金简奏准：因刻书种类繁多，付雕非易，不如刻做枣木活字套板一份，摆印书籍“工料省简悬殊”。遂于乾隆三十九年刻木质单字25万余个，并开始摆印图书。乾隆帝以“活字板”不雅而赐名“聚珍”。其间，用这套木活字共摆印了131种图书，嘉庆七、八年间又摆印了《西汉会要》、《唐会要》、《农书》3种，前后一共摆印了134种书。后人称之为《武英殿聚珍版书》。《武英殿聚珍版书》的刊刻，是我国古籍印刷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继承和总结了宋明以来各种活字印刷术的成果和经验，把我国古代活字印刷术推向了发展的高峰。此书问世后，由于所辑皆是罕传的珍本，各省几乎都照式翻刻，形成了所谓外聚珍本，影响极大，对促进清代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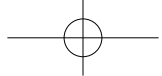
为总结经验方法，主持人金简编撰了《武英殿聚珍版程式》<sup>13</sup>一书。该书第一次从理论上概括总结了活字制作、刊印的全部工艺流程，言简意赅，图文并茂，通俗易懂，不仅在清代广泛流传，后来还被译成德、英等国文字，流播海外，为推动我国出版、印刷事业的发展，传播中华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八旬万寿盛典》是为祝贺乾隆五十五年皇帝八十岁寿辰而作。乾隆五十四年，大学士阿桂等

<sup>11</sup> 乾隆《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卷首，上谕，《四库全书》第657册，页619—620。

<sup>12</sup> 乾隆《钦定古今储贰金鉴》卷首，上谕，《四库全书》第694册。

<sup>13</sup> 参见《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卷首提要，《四库全书》第673册。



74人奏准编纂《八旬万寿盛典》，以记录乾隆帝生日庆典的盛大景象。由于准备工作充分，庆典过后即开始编纂，至五十七年十月全书编纂完毕。全书百二十卷，首一卷。卷首为：清乾隆五十七年阿桂等进书表，五十四年阿桂等请修《八旬万寿盛典》奏折，凡例，阿桂、嵇璜等74名纂修官职名及目录。卷一至卷四为宸章，收录乾隆帝古稀之后的御制纪念诗、文，间附编者按语；卷五至卷十七为圣德，是对乾隆帝敬、孝、勤、仁、文、俭、谦诸方面德行的记载和恭奉词；卷十八至卷二十为圣功，阐扬乾隆帝平定安南、缅甸、廓尔喀、台湾、甘肃等地的武威战功；卷二十五至四十九为盛事，记载皇室五世同堂、民间户籍增加、百姓增寿、粮食增产及赐千叟宴、科第职衔、辟雍讲学、班禅入觐等情况；卷五十至卷六十一为典礼，是有关贺诞过程中的庆祝、朝会、祭告、銮仪、乐章等；卷六十二至卷七十六为恩赏，记录当年的恩诏、蠲赋、恩科、东巡、恩宴、赏赉等情况；卷七十八至卷八十为图绘，为《八旬万寿盛典图》；卷八十一至卷一百二十为歌颂，辑入皇子、臣僚、生监等的祝嘏之词。书成，补入《四库全书》中<sup>①</sup>。

本书虽多溢美之词，却保留下当时的历史活动，以及典制方面的内容，是研究清史的必要参考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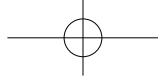
总之，乾隆年间，伴随着《国朝宫史》的编纂，或受其影响，清代官方对宫廷建筑、园囿、内廷人员及机构设置，以及典制、经费、收藏与文化活动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系统整理和记录，并为后代的宫廷文化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翔实资料，奠定了清代宫廷史、古代艺术与文献等诸多领域研究的重要基础；形成了宫廷学研究的雏形，为现代宫廷学研究，如研究领域、研究方法、成果体现等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附录]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所载乾隆敕修图书一览表<sup>②</sup>**

时间	敕修图书
乾隆元年	敕纂《世宗宪皇帝圣训》、《钦定三礼义疏》、《日讲礼记解义》、《大清通礼》
二年	敕撰《授时通考》
四年	敕纂《明纪纲目》
七年	敕撰《宫史》
九年	敕编《满洲氏族通谱》、撰《词林典故》及《石渠宝笈》、《秘殿珠林》，敕修《皇清文颖》
十年	敕撰《钦定天禄琳琅书目》，敕编《皇清奏议》，敕纂《续文献通考》及《皇朝文献通考》，《国语解》
十三年	敕纂《大清会典》、《大清会典则例》、《平定金川方略》
十四年	敕撰《西清古鉴》，敕编《经史讲义》
十五年	敕纂《同文韵统、叶韵汇辑》
十六年	敕撰《皇朝职贡图》，敕编《钱录》
十九年	敕撰《盘山志》

① 《八旬万寿盛典》卷首，进表，《四库全书》第660册。

② 以下资料均摘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〇四九，《翰林院职掌·纂修书史一》。



[续附录]

时间	敕修图书
二十年	敕纂《周易述义》，敕编《御纂诗义折中》
二十一年	敕纂《皇舆西域图志》、《热河志》
二十三年	敕编《御纂春秋直解》
二十四年	敕纂《皇朝礼器图式》
二十六年	敕修《宫史》
二十七年	敕纂《续文献通考》、《群庙考》
二十八年	敕编《钦定西域同文志》及《音韵述微》
二十九年	敕纂《宗室王公功绩表传》，敕修《大清一统志》，敕校勘《皇朝礼器图式》
三十二年	敕纂《续通典》、《续通志》及《皇朝通典》、《皇朝通志》，《御批通鉴辑览》
三十四年	敕修《校正淳化阁帖释文》
三十六年	敕纂《评鉴阐要》，敕编《御制清文鉴》
三十七年	敕编《平定准噶尔方略》
三十八年	编纂《四库全书》，敕纂《开国方略》，敕编《日下旧闻考》
三十九年	敕纂《临清纪略》、《武英殿聚珍版》、《平定两金川方略》，敕编《胜朝殉节诸臣录》
四十二年	敕纂《满洲源流考》，敕编《满洲祭神祭天典礼》
四十三年	敕纂《玉牒》，敕撰《国子监志》
乾隆四十四年	敕撰《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蒙古王公功绩表传》、《明季奏疏》，重修《盛京通志》
四十五年	续纂《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国史》、《契丹国志》
四十七年	敕编《河源纪略》，敕修《古今储贰金鉴》
四十九年	敕纂《石峰堡纪略》，敕编《清凉山志》
五十一年	敕修《南巡盛典》
五十三年	敕纂《平定台湾纪略》
五十六年	敕纂《八旬万寿盛典》
五十八年	敕纂《八旗通志》
嘉庆二年	敕纂《平苗纪略》

[作者单位：陈连营，故宫出版社；张楠，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责任编辑：宋仁桃)